

20世纪以色列城市化的发展及其影响探究

苏聪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以色列是全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发展的主要时期是20世纪中期。城市化的发展导致了农业的变革、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转变,尤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以色列的建国理念中有浓厚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色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未实现的乌托邦理想和伴随着城市化飞速发展的社会新理念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关系。

[关键词]以色列;城市化;资本主义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5.801

以色列是全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都居住在城市,并且这些人口中的四分之三主要集中在三大城市:特拉维夫、海法和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拥有五十万人口,另外两个城市拥有二十五和十五万人口。以《世界城市资源指数》作为评价标准,以色列显示出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尤其在农业发展上,以色列相比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其经济发展程度导致了高度的城市化。

一、以色列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民来到巴勒斯坦-以色列,每一次移民浪潮都持续很多年,而且每一次移民过后犹太的人口成倍的增长。1922年,巴勒斯坦只有83870名犹太人,1923-1926年间,超过67000人移民进入这个国家,使得犹太人的数量成倍增长。1931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在巴勒斯坦有175138名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又有173860名犹太人移民到这里,在建国后的四年里,超过700000移民来到以色列,使得人口再一次成倍增长。^[1]在以色列,犹太定居者保留着城市生活的传统。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工作已经成为大多数移民的收入来源。这个国家在自然资源贫瘠土地荒芜,要想发展农业几乎没有有什么可能,所以城市就成为人们定居下来获得生存的有效方式。

在20世纪30年代和1948年建国之后的两次大规模移民过程中,以色列的农业人口也获得了增长。从1922年到1931年,农村人口几乎增加了2倍,1948-1954年,农村人口增加了3倍。^[1]然而,随着每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许多农村地区被城市化所吞没,它们要么就成为大城市的郊区,要么就被划归为城市的一部分。1954年,农村的实际人口是286425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是18.8%。随着投资的大规模增长和人口的扩散,大约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都集中在从海法到特拉维夫-雅法的狭长海湾地带,这一区域仅占国土面积的11%,而占国土面积70%的南部地区却只拥有4%的人口。^[1]几乎整个的海岸地区,从北部的海法到南部的特拉维夫和拉法,逐渐的形成一个大的都市圈。

以色列的城市结合了西方工业城市的特征和那些以移民为主的城市的特征(比如墨尔本、悉尼、纽约和旧金山)。良好的市政管理,人们对城市生活的依恋,对工作机会的渴望,城市公共意识,对理性精神的追求,以成就为导向的价值标准,这些特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体现。同时,在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由于不同的族群表现的价值观不同,他们经常容易引起种族冲突。

大城市在以色列的国家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城市的发展不是基于对周围农村地区的扩张,而是基于城市的移民带来了经济上和社会结构上的城市化特征。城市的经济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招商引资,这些投资恰恰来自发达国家

的犹太移民,这表明了以色列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征。创新精神,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移民所拥有的城市职业传统和城市生活方式,推动了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结果就是使得以色列的工业产成品、贸易和服务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增长幅度遥遥领先于其他移民国家。比如,从1922年到1937年,工业产成品增长了18倍之多,在工业部门从业的人数从1922年的4750人增长到1952年的120000人,在1922年至1952年间,人口增长了16倍,而工人的数量却增加了25-26倍。在贸易行业工作的人从几千人增加到1952年的92000人。

以色列的职业结构越来越类似于那些城市化和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只有像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从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人口的比重才超过以色列。比较以色列和波兰的犹太人社,其共同特点就是从事服务行业的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在以色列是52%,在波兰犹太人社是58%。在以色列只有少部分的人从事农业,但是以色列的农业本身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变革。

二、城市化导致农业变革

对于犹太移民来说,在贫瘠荒芜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不是那么容易。巴勒斯坦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土地经过年复一年的滥用和侵蚀,大部分土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水资源稀缺,雨水稀少并主要集中在冬天的那几个月,剩下的漫长的夏季却滴雨不下。土地的利用率甚至比阿拉伯国家还低得多,更比不上东欧国家的土地肥沃程度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与以色列进行贸易,即使有少量的贸易,价格也是高昂的。每一次移民浪潮都会带来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同时,在粮食进口方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农民和邻近国家的阿拉伯农民之间存在竞争,使得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巴勒斯坦地区的农产品价格成为不可能。如果农业再沿着传统方式发展下去对这个国家很不利。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选择:第一,寻找一种经济作物(前期种植葡萄和杏仁,后期种植烟草和柑橘),这样可以使犹太农民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第二,成立国营农场。土地由“犹太国家基金”提供,设备和资金由“犹太成立基金”提供,劳动力主要来自青年志愿者,他们为了帮助自己的同胞在土地上扎下根,已经做好了牺牲个人生活标准的准备,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2]

在二战期间,由于进口的减少和对食品的大量需求,再加上在中东的盟军对食品的庞大需求,使得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上升。人力的短缺导致了部分的机械化,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犹太的农业从完全的赤字状况摆脱出来,农业由国家经营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移民来管理,逐渐的成为一项盈利的事业,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独立战争之后。食物的缺乏、定量配给的市场、有效的土地和机器设备的进口,这些因素促使以色列的农业获得一个长足的发展,在大多

数的情况下，通过政府补贴给那些农业减产的企业，使他们渡过难关。由于缺少外汇和为了保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色列政府试图改变农业发展的方向，遵循生产基本食品的路径，政府的这种尝试只获得了成功。

以色列的农业从本质上来说仍然保持着商业特征，它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城市市场。这种趋势加上城市化进程中物质刺激，促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变化。事实上，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以盈利为导向的商业企业，而农民跟随城市的生活方式，其行为、需求、娱乐、文化特征和心理态度也与城市居民相似。

三、乌托邦的理想与城市资本主义发展的博弈

以色列的建立是源于一种理念，即犹太复国主义，在此基础尚，又结合了社会主义的理念，为建立犹太-巴勒斯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体表现为对农村生活的偏爱以及对人力的过高估计和理想化，使人们向往回归朴素简约的生活。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城市文明，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美好的社会，这种信念与“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理念结合起来，为以色列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乡村生活的偏爱、反资本主义和倡导社会改革，这些理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知识分子群体中，在此期间也正好是犹太复国主义趋于成熟的时期。许多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这些思想潮流的领袖，比如马克·诺丹和塞奥多里·赫兹。反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所强烈鼓舞，他们倡导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复国主义获得那些生活在欧洲城市底层从事服务业的犹太人所支持，他们怀着美好的理想希望回到圣经中所应许的那块地方生活。一位名叫伯尔纳的希伯来作家这样写道：“只有我们学会了劳力耕作的秘诀，并且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唱着圣歌劳作才能称得上一个男人”。一位参加过一战后复国主义运动的伯格曼教授这样说道：“我们年复一年的在农村劳作，我们为了犹太复兴而奋斗，这不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把我们的文化理念扎根于这片土地，而不仅仅是我们在物质上对土地的投入，同样犹太精神也扎根于这片土地。乡村生活为我们实现这些理念提供了基础，这种理念从农村逐渐的影响到城市。”^[3]所有这些对农业的理想化，对农村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回归土地的原始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

基于种种的推动因素，复国主义者在一战前到一战后这段时间，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勤劳工作，他们主要集中在农业定居点。它包括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公共的定居点（Kvutza），第二种是合作定居点（moshav）。这两种定居点土地都是由“犹太民族基金”所提供，生产设备则由“复国主义运动基金”提供。^[3]在公共的或集体的定居点个人没有收入，定居点拥有并管理所有事物，居民们的所有需求都由公共的机构提供。而在小农的定居点，个人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他们的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在购买、出售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都需要和其他人鼎力合作，互相帮助。

这两种类型，是以色列前国家时期的最主要的农业定居方式，它的建立基于以下原则：“自力更生，不依靠其他人的帮助”，“不受雇佣”，这些定居点的基础是自给自足，“这里首先生产的是物质产品，这是人生存下来所必须的，但是不一定要去市场花钱购买才能得到物质产品”，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他们自己创造一种能有效管理自己生活的可能性”，“建立一个经济上平等的生活模式”。^[3]公共定居点的发展目标是在巴勒斯坦通过建立犹太人公社，继而建立犹太人自己

的国家，在公社里，最重要的财产和产品的分配能确保人们在经济生活上的平等。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消费产品的生产，取代了市场、竞争、贪婪、激情和欲望下所扭曲的生活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基于普遍平等的和谐的社会将要建立起来”。这两个定居组织都隶属于1920年成立的“劳工联合会（Histadrutb）”，“劳工联合会”的价值观和运作方式与农业定居组织颇为相似，即为绝对的社会和经济平等而努力奋斗，全体国民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犹太-巴勒斯坦国。基于这个目标，劳工联合会成立了若干组织，比如合作社、供销社、银行、贷款和储蓄协会以及保险公司。它同时也组建交通、生产和其他合作社。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拥有众多合作社和协会的“巴勒斯坦犹太工人共同体”建立起来了，它与“劳工联合会”相对应，它是通过控制这些组织来达到服务于劳工共同体的目的。上述规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孕育好了，那时的定居者是年轻的，组织规模不大，他们的想法是新颖而理想化的，其核心理念是按照自然规律，通过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努力和牺牲精神，不要资本主义和城市化，在一个落后的原始的地方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然而，自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巴勒斯坦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前所未有，生产逐渐的从消费中分离出来。实际上，人们对农村的偏爱逐渐消失了，虽然它仍然是官方所推崇的目标，目的是为了增加农业定居人口的数量和提高农业生产。体力劳动已经不再被人们过高的估计，在国家的收入中，实际上服务业已经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力劳动已经不被人们所羡慕，它失去了昔日的声望，公务员、商人、工人、店主和白领获得了很大的认同，城市的居民越来越羡慕这些职业。城市的思想、行为方式与奢侈品迅速扩展到国家的各个角落。简单的生活方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2]那种被先驱们所倡导的简单和朴素的生活方式在日渐削弱。在这种集体中，人们对“舒适”和“奢侈”的要求在增加，集体中的一些成员他们努力去获得这些物质上的享受，而不关心他们的同伴是否也同样获得。平等主义、反资本主义潮流和谋求社会公正的努力在逐渐减弱，这些理念被个人主义、自由和竞争所取代。

实际上，一直发展较为平稳的集体合作化运动为以色列通向乌托邦铺平了道路，在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这种运动成为踏上资本主义潮流的重要一步。经济的发展使得很多合作社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利益，比如隶属于“劳工联合会”的供销和市场组织，虽然从官方上来说，它们仍然是“工人党”财产，被委员会所控制，但是实际上比起国有企业，工人已经没有什么权利和产权了。有的合作社具有行业垄断地位，例如交通合作社在交通领域保持垄断地位，能制定价格，获得了大量的利润。根据一份报告所指出的，“这种合作社垄断了国家的经济生活，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比私有企业严重得多。”公交车司机转向与私有企业合作，私有企业雇佣了他们，付给他们很低的薪水，但是他们所得到的薪水还是比最高法院的法官或高级政府公务员所得的要多，而且他们还能获得更多额外的收入和利益。“劳工联合会”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建立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它缩减雇员数量，通过集体所有制的方式来剥削工人的利益，目前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大效用了。1956年8月，在政府和交通合作社之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后者要求政府提高公共交通领域里的票价，在持续了九天的罢工之后，双方达成协议，政府最终满足了他们的

要求。^[4]

公共定居点将自己出产的50%的农产品向城市出售，因此与其他的厂商存在激烈竞争。这就要求集体农场要有更好的管理，合理的平衡劳动力、机械化和效率之间的关系。这同样意味着公共定居点的所有经济活动都要在存在收益的范围内进行。由于规模的扩大，集体合作社现在必须依赖于好的管理、效率和专家才能更合理更专业的处理日常经济事务，所以这种集体合作社带有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集体合作社经济是在其他企业的竞争下才改变自身的行为模式，优秀的集体企业也同样受“外部竞争组织”的影响和支配。

在农业的各个不同领域的从业人员，比如秘书、专家、技术人员、拖拉机司机以及其他熟练工人他们为了完成复杂的工作任务，都必须拥有专业知识或工作经验，这样他们既不会被轻易取代也不会被安排到别的工作岗位。因此管理人员和熟练的技术人员从普通工人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他们拥有更高的声望，在企业中的地位也比普通工人要高，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认为更重要，更能带来收益。这种分层得到集体合作社的宣扬，宣称企业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有决定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人之间的分化更加明显。整个组织更加庞大，成员的数量更多，一小部分熟悉内幕的专家的意见在决策过程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普通成员丧失了在大会议上的利益，他们甚至都不去参加大会了。因此管理层变成唯一可以运营企业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逐渐演变成“老板”，他们的话和意见是具有决定性的。在集体企业中，由于存在着发展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在普通成员中出现了附属或依附的感觉。这种在普通成员中蔓延的“附属或依附”的感觉对促进平等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在这个组织系统中也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4]

在集体企业里的不同阶层中的社会分化和差异，那些没有专业技术的工人因为依附所带来的羞耻感在逐步加深，而且随着管理层中的一些人被吸纳到劳动党、其他机构和政府的某些部门，这种社会分化程度在进一步加深。因此“阶级”分化更加严重，“管理阶层”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他们在政治上所获得的职位，成为议员、劳工联盟的书记。另一个问题是在集体定居点中存在着雇佣工人问题，所有被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限制“剥削”的解决方案都没有多大的效用，这样就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形成一条巨大的鸿沟，继而导致集体定居点危机的发生。^[4]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色列城市化的步伐在加快，公共定居点开始为城市提供更多的产品，在定居点内部的宣传所反映的过去“田园牧歌式”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类型的社会里所固有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凸显。这样的宣传揭露了官僚作风的盛行，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出现问题，内部成员互相竞争，缺少真正的平等。比如，1957年，由于部分地受到外国顾问的影响，以色列政府制定了新的农业政策，旨在增加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减少禽类、蛋类和牛奶的生产，这样就需要花费大量的外汇从国外购买这些产品，这被认为是提高国家经济地位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一步。那些在国家经济建设中贡献了巨大力量的集体企业反对这项政策，他们担心这样做会使自己的收入下降。事实上，由于这些组织给政府的巨大压力，使得这项政策没有获得实施。在几年前所制定的七年经济规划已经转变为一个新的四年规划纲要。在犹太人的组织里，工资和薪水上

所倡导的平等主义为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贫富分化铺平了道路——这种贫富分化程度接近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劳工联合会引以自豪的是：他们是这个国家原则的建立者和主要支柱。政府内阁的许多成员甚至总统都大部分来自劳工联合会的前任领导人。这些组织的大多数成员都毫无疑问的为保卫国家做好了准备，一旦紧急情况出现，他们随时就会奉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在和平年代他们遵循的是普遍的潮流，即以成就为导向的价值标准和对消费的高度追求。^[5]

结语

巴勒斯坦-以色列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它已经成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城市化程度甚至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以色列城市化的完成是由一系列现象作为标志的，这与其他国家一样：农业上和农村生活的重大变化，劳动力、专业化、产业化和机械化的分工，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理念、理性主义趋势和以成就为导向的价值标准，对消费品和奢侈品的需求。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方面的巨大满足，因此也推动了对次要需求的追求和对额外需求的认同。

以色列所有城市化发展的趋势使它们的体制和理念也有可能被誉为生机和活力的象征，使得这个国家能适时调整自己以应对任何的变化。然而，在以色列，反对城市化、提倡平等主义的思想落后于城市化发展的现实，它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关系的紧张，使得传统的社会结构出现不平衡。以色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不是根深蒂固的农民脱离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的价值观终结，也不是传统的手工业工人被取代，而是实际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自然环境”更确切的说是一种希望，一种对乌托邦理想的追求，这个乌托邦的理想是可以评估的，它由一系列农村的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简约朴素原始的理念所组成。也许因为这个理由“分裂性的力量”能够在短时间内更加容易的完成这项工作。它仍然保持着微弱的社会结构，乌托邦理念的发展落后于物质上的进步和由于社会进步所引起的观念、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是为建立国家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未实现的乌托邦理想和伴随着城市化飞速发展的社会新理念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雷钰. 以色列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58-59; 86; 95.
- [2] 张倩红. 以色列史 [M]. 人民出版社, 2008: 168-170; 195.
- [3] 虞卫东. 当代以色列社会与文化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205-208; 233; 310.
- [4] 哈伊姆·格瓦蒂著, 何大明译. 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98; 207; 286.
- [5] 诺亚·卢卡斯. 以色列现代史 [M]. 商务印书馆, 1997: 209-210.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20世纪英国的生态思想及其实践研究”（项目号：2021JD033）的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苏聪（1983-），男，湖南株洲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拜占庭史、西亚史。